

雨花台
革命烈士故事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雨花台 革命烈士故事



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史料室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雨花台革命烈士故事

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史料室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170,000

1983 年 4 月第 1 版 198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书号: 11100·098 定价: 0.60 元

责任编辑 徐 明

目 次

忆侯绍裘烈士	侯佩琛(1)
追忆绍裘同志	毛啸岑(3)
和绍裘同志相处的最后几天	高尔柏(6)
纪念先师侯绍裘	范志超(9)
“作一个有用的人”	曾鼎乾(12)

——回忆母亲的教育

姐姐的少年时代	郭凤林 郭凤书(25)
---------------	---------------

——回忆郭凤韶烈士

回忆郭凤韶	徐明清(31)
回忆恽代英烈士生平	恽子强(35)
同代英生活在一起的日子	沈葆英(41)
恽代英在宣城的活动片断	吴蔚春(50)
恽代英印象记	倪崇高(54)
关于恽代英烈士的一些情况	匡亚明(56)
“永鰥痴郎”的爱情	张 羽(58)
代英同志的教导毕生难忘	同 生(67)
谭寿林的青少年时代	谭寿钦(73)
忆谭寿林同志	钱 瑛(75)
回忆邓中夏同志	秦德君(79)
对邓中夏同志的回忆片断	马乃松(85)

中夏同志的最后一年	陈农菲(88)
最后一次见面	夏明(100)
——忆中夏	
东北抗日联军和罗登贤同志	冯仲云(106)
登贤同志的两次被捕	周冷波(109)
怀念罗登贤同志	薛雯(111)
光照千秋	黄静汶 杨放之(114)
——记黄励烈士	
回忆我的二妹徐全直	徐全德(130)
女党员之杰出者	帅孟奇(138)
——记何宝珍烈士	
人的价值	葛和林(146)
——忆顾衡烈士	
不屈的女战士郭纲琳	陈农菲(158)
高波同志在烽火剧团	李强(178)
高波同志在狱中	曹又参(190)
我的父亲刘亚生烈士的青少年时代	刘忠(192)
刘亚生	郭鹏(197)
回忆卢志英烈士二三事	张育民(222)
视死如归不动摇	孙稚如(225)
——忆卢志英烈士在狱中	
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	卢大容(229)

忆侯绍裘烈士

侯佩琛



我的弟弟绍裘小名鳌，一八九六年四月出生。弟弟下巴上有一颗很大的黑痣，雪白的小脸上多了一样东西反而显得更加可爱，家中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尤其是祖母。

周岁以后，弟弟已经会说话了。祖母有时生了气，只要把鳌弟抱给她，就烟消云散，什么事都没有了。

鳌弟四岁上学，很聪明。启蒙老师沈仙根先生，是父亲的朋友，常常对父亲说：“这孩子性情和易，说话真诚。年纪虽小，一举一动和其他孩子不同，你要好好地培养他。”

那时父亲因不善经营，经商失败。常常苦思焦虑，已有一身疾病，还不时要到店中筹划一切。难得有暇在家休息，他才讲些故事给我们听。鳌弟最喜欢听《水浒传》，当听到英雄末路，被逼得有家难归，他总是眨着小眼睛，愤愤不平地挥着拳

头，嚷嚷着要报仇。有一年，母亲生了一场大病，好几个月还未痊愈，一家人都很焦急，他郑重其事地说：“母亲病得真苦，幸亏我听话，不然妈妈还要苦呢。”父亲让他说得笑了起来。

弟弟十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商店随之也倒闭了，家中经济状况很不好。由于请不起先生，弟弟只得每天步行很远，到堂兄家去读书，直到十三岁那年，他才进了当地华娄高等小学读书。弟弟十七岁时考进了省立第三中学。

在中学时代，弟弟的思想起了变化，开始注意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每逢神赛会等事，他最为反对，常说：“迷信不铲除，科学就不能进步。”他和同学李均才、朱允文等都是不满二十岁的有志青年，课余之暇，常常纵谈国事，并印刷小型的宣传品。

整弟见地方上种种黑暗，就与友人沈联璧、钱江春等创办《松江国民日报》，揭露时弊、主持正义，宣传革命道理，因此，地方豪绅颇为仇视，不久便被迫停刊。我记得很清楚，一次，弟弟在《松江国民日报》上登了一篇欢迎孙中山先生的文章。不料，第二天就有人在另一种地方报上登了反对他的文字。

后来，弟弟考上“南洋公学”，我在“务本女塾”读书，见面的机会渐渐少了，偶尔碰头，也是略谈数语。直到他民国十六年殉难为止，其间不过匆匆数面，只有儿时的情况，历历如在眼前。

追忆绍裘同志

毛 啸 岑

一九二〇年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吴江县第一次全县代表大会时，一个高高身材，瘦瘦脸庞，面颊上有颗黑痣的青年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得知，他是江苏省临时党部派来参加会议的侯绍裘同志。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吴江县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侯绍裘提出“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并号召大家要与教会做斗争。当时，我不明白这个道理，既然主张信教自由，为什么要反对教会？绍裘同志开导我说：“教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之一，这和信教自由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我们当前的斗争，光喊打倒军阀没有用，必须和军阀的靠山——帝国主义做坚决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为了配合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侯绍裘派我到南京路和浙江路一带商店联系罢市之事。临行前，他郑重地关照我，必须勇敢，假如碰到意外，要机警些，不要害怕，更不能临阵退缩。当时我问绍裘同志，为什么法商水电公司不罢工？绍裘解释说：“这是交换条件，是另一种方式的斗争。‘法租界’当局现在允许我们半公开活动，我们就来个欲擒故

纵,这样对我们有利。”

绍裘同志教我各种秘密工作的方法。如怎样秘密接头,怎样化装才看不出破绽。特别关照我当有人从背后喊自己姓名时,不要立即回头,防止特务跟踪逮捕。有次侯绍裘同志挟了一包宣传小册子,带我到南京路的商店去散发。他叫我在外面望风,他自己装成买东西的人,走到靠里面的柜台边,抽出一本小册子,放在柜台上,然后若无其事地离开。象这样散发了几户人家以后,就由我来散发,他为我望风。经过这次锻炼后,我的胆子大了,也更老练了。

当时,在生活上尽管十分艰苦,但同志们互相帮助,心情是愉快的。有一次,我知道绍裘身上没有钱了,饿着肚子,我还有一百多个铜板,要分一半给他,他坚决不收。一天中午他到我家时,我正在炒螺蛳,便留他吃午饭,并抱歉地说没有菜。绍裘同志风趣地说:“唔,这可是只好小菜呵。”我的儿子正在呀呀学语,绍裘同志把他抱起来,教他唱:“小小瓶,小小盖,小小瓶里有只好小菜。”

同年四月七日晚,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南京金陵春酒家设宴欢迎蒋介石。绍裘同志关照我们要多悬挂些横幅标语,写上“欢迎革命的蒋总司令”。我对这种做法有些不解,绍裘同志说:“欢迎革命的,就是不欢迎反革命的蒋介石。”黄竞西同志擅长排笔大字,就包揽书写标语,我和刘重民负责悬挂,不一会儿,就完成了。九日下午一时许,江苏省党部被暴徒捣毁,张曙时同志被绑架失踪。傍晚,侯绍裘约我在四象桥南洋旅馆商讨对策,定于翌日召集十万人的群众大会,示威请愿,向

蒋介石提出三点要求：（一）释放张曙时；（二）惩办捣毁省党部的暴徒；（三）执行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第二天当我们到达会场时，得到密报，有暴徒准备暗杀侯绍裘同志。担任会场纠察的是兵工厂的工人，他们闻讯后要回厂携枪前来保护。绍裘同志认为不妥，担心到会群众可能发生意外。于是和工人纠察队商量作了适当的自卫工作。九时许，会场情况越来越坏，同志们都劝绍裘离开会场为宜，绍裘同志才越墙而出。临行前，他握着我的手说：“大会由你和刘少游（当时南京市党部负责人）同志负责，如果斗争失败，我们各回家乡，一切从头做起。”不料从此一别，竟成永诀。

和绍裘同志相处的最后几天

高 尔 柏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四月十日，侯绍裘同志就惨遭杀害。四月二日，他刚率领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人员由上海迁来南京。在这七天中，我一直和他在一块儿工作。

这七天是日以继夜的七天，他要领导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筹备组织江苏省政府，经常抽时间和同志们研究各部门的工作，给予详细的指示，使同志们了解当前形势，明确工作方向。一天，他和我研究江苏省党部宣传部的工作时，严肃而诚恳地说：“在当前的形势下，宣传工作特别重要，必须抓紧。我们的敌人是不少的，外有帝国主义的造谣中伤，内有反动派和军阀的破坏伎俩，特别是蒋介石已有异心。我们必须根据孙中山总理的三大政策，对广大群众进行有效的宣传。揭露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阴谋，使人民有清楚的认识。只有贯彻总理的三大政策，中国革命才能成功，中国才能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中国人民才能过好日子。现在我们除日常的宣传工作外，应该专门筹办一个日报，作为江苏省党部的宣传工具。”绍裘同志详细指示了具体步骤。当时在宣传

部工作的同志，听了绍裘的话都很激动，愿意以百倍的努力来完成这个任务。可是，日报尚在筹备中，蒋介石就叛变了。

一九二七年四月的时局是严重的，驻在南京的第二军、第六军都在陆续撤离。因为这两支军队的政治部负责同志都是共产党员，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蒋介石命令他们离开南京，使我们失去了支持的力量。我和绍裘同志在路上恰好遇到一队队的士兵往城北退去，绍裘担心地说：“形势变得更不妙了。”听了绍裘的话，我心情很沉重。

江苏省党部由上海迁来南京后不几天，局势发生变化，公安局长温健刚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省党部成员、共产党员张曙同志被捕；我党与外界联络的电线被切断，我们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当时绍裘同志敏感地察觉到形势可能要变，但不知陈独秀的态度，也不知党中央将采取什么措施，屡次电报请示中央，不见复文。绍裘同志决定派刘重民同志去武汉当面请示中央。谁知沿江船只被封锁，刘重民同志无法成行。绍裘同志更焦急了，他在房中踱步自语：“如果中央迟疑不决，大好形势就要被反动的乌云所笼罩。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对中国革命的前途负有重大责任啊。假如中央采取些断然措施，凭我党在第二、第六军中的影响，即使蒋介石玩弄阴谋，南京的形势也不至于变得太糟。”

四月八日，外面风声更紧，谣言很多。绍裘同志仍象平时那样工作，毫不惊慌。当时江苏省党部在安徽公学办公，我和他都住在后院。有人提醒他，为防万一，先租个房间把家属和行李搬出去。他对我说：“我们不怕危险，家属不怕有危险，

行李丢了也无所谓。我们是负责人,更不能随便行动,惊恐不堪。我们不要搬吧。”绍裘同志的坚定态度感动了我,我们决定不搬出安徽公学。第二天,特务闯入省党部,乱打乱抓,我们两家的行李都被砸烂、撕破。事后他说:“损失些行李算什么,生命都随时准备着呢。”

四月十日,他参加一个会议前对我说:“今晚参加会议的系各团体的负责人,研究当前的紧急形势和如何应付的问题,有重要决定。回来后我们仔细研究工作吧。”我关照他:“外面情况不妙,要小心些。”他拍拍我的肩笑着说:“没关系,放心吧。”一挥手就走了。整整一夜我们都等他回来,左等右等不见人影,大家都预感到出事了。天一亮,我和我爱人及一个知道开会地点的同志去寻找绍裘同志。走到会场处,一个老太太对我们说:“昨天这儿抓了许多人,你们快走吧。”我们还想问清楚情况,她却不理睬我们,径自回屋内去了。从此绍裘同志再也没有回来。听说绍裘同志被杀害后,遗体装入麻袋,沉入秦淮河中。

纪念先师侯绍裘

范志超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侯绍裘和朱季恂开办了一所新型的学校——松江景贤女子学校。学校的宗旨是：“打倒封建主义，解放妇女。”他们办学的目的是培养新型的妇女，改革落后的社会。他们办学的方针是艰苦奋斗，宣传马列主义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我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侯绍裘同志是引我走向革命道路的导师。

记得一九二三年时，侯老师带了我们一班同学去松江城内的府皇庙参观。一跨进庙门，有些胆小的同学就窃窃私语，畏惧得很。侯老师哈哈一阵大笑，随手抓起一个泥佛头，向同学们说：“如果它有灵，应该立即同我搏斗，其它泥佛也该出来助威。可现在它仍在我手里。这就证明这些泥佛不过是堆废物，白白占了那么多公房。若我们将此地改成教室该多好啊！”话音未落，又有几个泥佛被他推倒。旁边有几个同学也行动起来，把泥佛砸了个稀里哗啦。事情传到一帮封建思想顽固的老头儿那里，他们大骂侯老师是“过激党”、“行动有伤风化，亵渎圣灵……”。我们未予理睬，反封建的第一仗打胜了。

又一次，侯老师以“远足”的名义，带我们去城外的秀野

桥。走到一大片荒坟地时，发现有骷髅露在腐朽的棺材外面。侯老师说：“这不是可以作为我们实验室的好教具吗？”说罢，他袖子一卷，两手捧起一个骷髅头，走到河边，将它洗得干干净净，给同学们上起课来了。然后，掏出一块手帕把它包起来，问大家：“谁敢捧回学校去？”同学们都抢着说：“我来，我来！”后来，社会上刮起了一阵“过激党又在教女学生做坏事了”的歪风，我们却欣喜这第二次反封建斗争的胜利！

在景贤女子学校中，妇女解放的风气很浓，有个女青年为了逃避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远道投奔到我们学校来学习。侯老师不但热情欢迎她，还免收她的学、膳费。不久，她母亲知道了，先跟我们师生辩论，理屈辞穷后，又软硬兼施，硬逼那女同学回家。我们同情她，说服她，挽留她。但侯老师发现该同学意志不坚，也就不强留她了。事后，侯老师对同学们教育道：“革命是痛苦的，坚强的革命意志全靠自己磨练，别人是代替不了的！要冲破封建锁链必须有坚强的意志！那个老太婆满口仁义道德，礼仪忠孝，那是杀人的软刀子。”侯老师的言词干脆利落，这些话我印象一直很深。

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党政府迁至武汉，三月，我也到达。四月二日，江苏省党部搬移南京。侯老师就以江苏省党部负责人的名义拍电报给我，邀我去南京，任代理省党部妇女部部长之职。当时，我毫不犹豫，欣然答应。我比侯老师先三天到达南京，相见共叙师生友情，倍觉亲切。从个人经历谈起，一直谈到夜里两三点钟还没有结束，我怕他精神不济，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就料理他的床铺，再三催他休息。

一天，他派我出席在夫子庙举行的群众大会，代表省党部讲话，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他见我健康状况较好，工作负责，高兴地带着老师的口吻对我说：“志超，你的任务会一天天地加重，你要帮我做许多艰巨的工作，可值得信任的朋友太少。”我并不因为受到信任而感到不知所措，倒是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而担心，因为不能担负更多的革命工作而心情沉重。我半晌说不出话来，他着急地问道：“志超，你对我的话有什么感慨吗？”我答道：“多少总有一点，我尽力做你的忠实信徒就是！”

在我去夫子庙赴会的时候，他也出门去参加一个秘密会议。临走他语气沉重地问我：“今天难保没有特务捣乱，你怕不怕？”随后，他又关照我：“志超，小心些！”我只回答了一句话：“我把全部生命都交给人民大众了。”“好！我的信徒！”他挥着手里的一卷纸向我微笑而别。

啊，敬爱的侯老师！谁能想到，这短短的交谈，竟是我们永诀的话别。

当我开会回来，天已黑了。晚饭时侯老师没有回来，一直到更深夜半过后，还不见侯老师的踪影，我当即就有了不祥的预感，通夜不能入眠。第二天清早，我就坐在办公室里带领几个女学生一起工作，实际上是等待侯老师的归来。不到中午，一大群流氓特务闯进来行凶捣乱，他们手执木棍、武器，还带有绳索。有两个恶徒将我的双手向后绑起，正在这时，第六军的一位武装同志进来，把我们虎口中救了出来。而我敬爱的老师却在四月十日深夜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装入麻袋乱刀戳死，沉入秦淮河中。

“作一个有用的人”

——回忆母亲的教育

曾 鼎 乾



我的母亲陈君起烈士，被蒋介石杀害五十六年了。至今，母亲的音容笑貌，还常常浮现在我眼前；她对党的无限忠诚、英勇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精神，尤其她对

我的严格要求、谆谆教导，还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一)

母亲是上海市嘉定县南翔镇人。为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约一九〇四年逃往上海，进入务本女子学校读书。毕业后来南京教书，约一九〇八年同我父亲结婚。由于不堪封建大家庭的压迫，于一九一三年与之决裂，带着我们姐弟三人，搬出去独立生活。父亲由于思想守旧，大不为然，后来，他前